

城乡融合发展导向的乡村生活圈构建：价值、挑战与规划思考*

Developing Rural Life Circles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Values, Challenges, and Planning Reflections

孙莹 张尚武 忻晟熙 彭锐 王雅娟 臧雯璐

SUN Ying, ZHANG Shangwu, XIN Shengxi, PENG Rui, WANG Yajuan, ZANG Luanxuan

关键词 乡村生活圈；城乡融合；开放性；多类型；多尺度；差异化

Keywords: rural life circle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penness; multi-type; multi-scale; differentiation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506008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5)06-0049-06

提 要 乡村生活圈构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支撑。当前对乡村生活圈的理论探讨和规划实践，多局限于微观社区范畴或乡村内部系统，而对其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和导向中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提出乡村生活圈构建的分析框架，认为乡村生活圈构建应具有综合性内涵和战略意义，需要加强对城乡关系变迁、乡村生活系统结构性变化及乡村生活圈在城乡地域功能和空间组织层面价值和意义的整体认识。以城乡融合为导向的乡村生活圈构建，具有城乡系统的动态开放性、多类型多功能与多尺度的复合、空间组织的地域差异性等基本特征。在城乡关系变迁下乡村地区面临人口收缩和社会结构转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城乡地域空间系统重组的挑战。从面向乡村发展不确定性、“三农”结构性变化、乡村空间格局重构、城乡双向流动趋势等提出对乡村生活圈构建的规划思考。

Abstract: Developing rural life circles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pilla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es strategic support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urrently, both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planning practices are primarily confined to micro-community scales or internal rural systems, with insufficient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rural life circles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rgu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ife circles should embody comprehensive connotations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t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evolving urban-rural relations, structural shifts in rural life systems, and the role of life circles in territorial functions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Developing rural life circles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ynamic openness of urban-rural systems, the complexity of multi-scale and multi-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ly differentiated pattern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Amidst ongoing shifts in urban-rural dynamics, rural area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population decline, social restructuring, changes in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style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urban-rural territorial spatial systems. Finally, the paper offers planning reflections that respond to uncertaint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San No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sector,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growing trend of two-way urban-rural mobility.

作者简介

孙莹，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副教授，sunying0103@aliyun.com
张尚武，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能规划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忻晟熙，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能规划技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彭锐，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科技大学乡村规划建设与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王雅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通信作者，wyajuan@tongji.edu.cn
臧雯璐，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数字经济背景下镇村体系空间特征、演化机制与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3NDJC090YB）；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主体治理结构对乡村规划实施绩效的影响机制与优化策略”（项目编号：52208089）；“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土空间优化与系统调控理论与方法”（项目编号：2022YFC3800800）；上海市白玉兰人才计划（浦江项目B类）“城乡融合导向下的上海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实施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4PJ021）

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三农”问题、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城乡关系政策不断深化，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持续体现国家推动乡村发展、提高乡村生活质量的战略导向。在此背景下，乡村生活圈的高质量构建成为促进城乡融合、提升乡村宜居性与整体功能的重要空间路径。

当前对乡村生活圈的理论探讨和规划实践，多局限于微观社区范畴或乡村内部系统，而对其在城乡地域功能、空间组织、要素流动等宏观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乡村地区生活空间高分散、低密度、差异化的特征，决定了乡村生活圈的构建不能简单套用城市生活圈模式，需要将其置于连续开放、动态演进的城乡系统中，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战略导向，重新认识其价值特征、空间组织和治理逻辑。本文立足此视角，尝试构建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生活圈的分析框架，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认识其构建的价值、面临的挑战以及规划思考，以期对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

1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生活圈的价值

1.1 乡村生活圈规划实践及认识局限

生活圈概念最早始于1960年代的日本，随后扩散至亚洲国家和地区，其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广义的生活圈是超越社区尺度、以满足居民各种活动需求形成的地域功能体系，具有提升广域人居环境品质的内涵。空间上具有功能层次性，可以划分为社区生活圈、基本生活圈、通勤生活圈、扩展生活圈以及都市区之间的协同生活圈等不同的空间层次^[2-4]。狭义的生活圈一般理解为社区生活圈，作为营造社区生活、共享公共服务的基本空间单元^[5-7]。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的转型，以上海2035总体规划为代表，加强社区生活圈建设成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策略。从居民需求和时空行为出发研究社区设施的分布配置、探讨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和社区规划，

体现以人为本、面向生活的基本理念，成为城乡规划研究和实践的重要领域。上海在2016年最早发布了《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8-9]。2018年国家发布的新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以生活圈概念取代了传统“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的分级方式，标志着规划理念与方法的重要转型。各地相继优化、细化地方生活圈建设导则，探索生活圈规划实践。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生活圈作为一种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资源配置的单元，也被引入乡村地区并应用于乡村规划实践^[10]，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研究内容聚焦于层级体系划分和对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优化。2019年上海率先启动《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导则》编制工作，2021年发布全国首个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并开展乡村生活圈试点^[11]，自然资源部于2021年发布的《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也涉及了乡村社区生活圈的内容^[12]。

总体上看，当前生活圈规划实践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领域，对乡村生活圈特质、功能及空间组织等方面尚缺少系统性研究和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将乡村生活圈简单类同于城市社区生活圈，忽视乡村生活系统与城市的天然差异，对乡村的分散性、低密度、不均衡以及乡村居民出行方式等因素关注不足，如采用“5—10分钟、15分钟、30分钟”对乡村公共服务进行标准化的安排^[13-16]，忽略乡村空间的差异性、功能的综合性和多元化的需求。

二是将乡村生活圈视作相对独立的系统，构建多局限于乡村内部，如按照“乡集镇、村/组”或“行政村、自然村”的布局方式，忽略乡村生活系统的开放性和日益广泛的城乡联系。

三是将乡村生活圈构建窄化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更多关注设施的空间静态布局，忽视乡村“生产、生态、生活”融合功能和非空间要素对乡村社区形成的决定性影响。

此外，目前在实践中，对乡村生活圈的认识和应用尺度还主要局限于微观范畴，对城乡地域功能变迁的宏观过程和影响，认知不足且缺少动态思维，特别是很多乡村地区正在经历人口收缩、

城乡关系变化以及乡村地区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等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这些动态变化因素也构成了乡村生活圈构建及规划实践需要面对的难题。

1.2 乡村生活圈的综合性、基础性和战略性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路径，也构成了乡村生活圈构建的基本视角和价值取向。乡村发展问题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需要在城乡关系调整中寻求答案。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城乡现代化视角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人的发展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根基。城乡空间和社会形态的差异及城乡差距扩大的必然性，使得乡村宜居性退化与个人失去发展机会互为因果。因此，乡村生活圈构建需要综合个体发展和宏观社会建设两方面内涵，本质是提升乡村的宜居性，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支撑。从城乡融合的目标出发，乡村生活圈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乡村生活圈的综合性。面对乡村内部结构变化、城乡关系转型和国家战略导向，乡村生活圈包含了狭义的生活质量和广义的人居环境品质，表现为治理、功能、空间的融合性。从个体发展出发，生活圈为乡村居民提供多元化生活服务。同时，从乡村社会发展出发，推动实现城乡功能互补，突出乡村在绿色生态、安全韧性、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功能，创造乡村发展机会和吸引力。

乡村生活圈的基础性。保障乡村居民生活质量，通过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是乡村生活圈的基本定位作用。以日常生活圈作为乡村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以完备的乡村基础服务体系，满足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学等多场景生活需求，并建立起保障乡村社会稳定及安全韧性的基本防线。

乡村生活圈的战略性。构筑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为城乡现代化提供支撑

和保障是乡村生活圈构建的宏观价值所在。以构建高品质乡村生活圈为载体，通过城乡生活和服务一体化推动形成城乡连续的地域空间体系，进一步促进城乡要素循环和乡村地区的价值转化，以及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这将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2 乡村生活圈构建的基本特征

以城乡融合为发展导向的乡村生活圈特征认识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视角，置于更大的城乡地域系统，乡村生活圈构建具有城乡系统的动态开放性、多类型多功能与多尺度的复合性、空间组织的地域差异性等基本特征。

2.1 城乡系统的动态开放性

传统农耕社会是以人地关系为基础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生产生活系统，在工业化、城镇化影响下乡村地区趋于走向开放系统，乡村生活圈不再是简单地以乡村聚落为中心延展出来的时空圈层，而是打破城乡界线的开放动态系统。

从居民需求角度，城乡互动的服务需求在不断增加。一方面，随着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变迁，乡村人口的流动性、老龄化、乡村居民的分化以及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满足乡村居民的服务供给等，都需要在城乡互动的更大空间里进行配置。比如，当前乡村地区突出的老龄化问题带来对医疗和养老设施的迫切需求，乡村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使得城市基础教育设施必须考虑周边乡村地区的诉求等，很多方面都展现出城市设施对乡村的影响愈发明显。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乡村空间特有的生态、文化、教育等价值功能的体验、旅游等需求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乡村生活圈不仅要满足乡村居民的代际需求，也要服务于城乡不同群体的需要。

从居民行为角度，城乡居民活动的时空界限不断突破。乡村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日益呈现城乡时空互动的趋势。这一特征在大都市尤为明显，笔者团队针对上海浦东近、远郊城乡生活圈组织模式的研究证实，乡村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向镇区和城区不断渗透，无论是居住、就业，还是获取公共服务，都表

表1 上海浦东近、远郊两镇居民出行的空间范围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residents' travel spatial ranges in near- and far-suburban towns of Pudong, Shanghai

居民活动	出发地	目的地构成 / %				
		镇内	主城区		南汇新城	其他郊镇
			浦东内部	浦东以外		
通勤	近郊某镇	7	44	15	1	33
	远郊某镇	8	15	13	21	43
非通勤 (工作日)	近郊某镇	47	25	10	1	17
	远郊某镇	27	9	15	7	41
非通勤 (休息日)	近郊某镇	28	39	12	1	20
	远郊某镇	16	12	19	8	45

资料来源：徐馨阳. 上海郊区乡村生活圈构建模式研究——以浦东新区为例[D]. 上海：同济大学，2024.

现出明显的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特征（表1）^[17]。有研究^[18]显示，乡村家庭的代际行为也使乡村居民的社交空间突破传统乡村聚落，乡村社会关系在城乡时空重构和延展。近年来大城市周边村庄里的新村民、数字游民等新现象，已反映出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向乡村地区的渗透。

在城乡融合发展导向下，乡村生活圈构建要打破非城即乡、城乡分割的传统认识，将镇村置于更大的城乡区域系统，关注“城—镇—乡—村”各个层级的资源互补、服务共享和衔接协同，同时以高效的连通性支撑城乡居民的便捷服务，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资源开放配置。

2.2 多类型、多功能与多尺度的复合

乡村生活圈的复合性是其区别于城市社区生活圈的核心特征之一，表现为多类型、多功能与多尺度等特征。

首先，与城市空间的功能分区不同，乡村地域本身就具有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相互重叠、功能交织的天然属性。乡村生活圈作为生活空间系统的组织形式，包含了日常生活、耕作就业、公共服务、游憩休闲等多类型活动，农村生产生活功能的复合延伸，生态功能嵌入及经济转化，是未来乡村现代化的趋势。

其次，满足乡村居民不同群体、不同频次、不同类型的生活需求，一般包含以下主要空间尺度。①邻里生活圈。满足居民围绕村庄范围展开的居住、交往等日常活动需求，涉及的活动频率高，步行范围可达。②日常生活圈。满

足乡村居民大部分基础性生活需求，比如日常通勤、就医、就学、养老等基础服务，一般涉及乡镇域或跨镇范围。③拓展生活圈：提供专业化、品质化、个性化的生活服务，以居民非日常活动为主，比如大宗消费采购、周末休闲娱乐，空间上涉及县域或邻近区县。④协同生活圈。在快速交通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满足城乡居民在更大地域范围内的高等级需求活动，也是支撑中心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双向流通圈层。

乡村生活圈涵盖村、镇、县、城等不同空间尺度，是一个多尺度复合的连续居民点体系（图1）。比如，同样是日常生活圈，以基础医疗和养老需求为主的老年人，其日常活动范围往往以镇域甚至村域为主，而青壮年的日常通勤则可能拓展到县域甚至乡—城之间。近年来，随着城乡连通性增强、时空距离压缩，村—县或村—城之间的就医就学、购物消费等越来越成为一种日常需求，乡村居民日常活动出现越来越多的空间跃迁，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生活圈在城乡时空上的延展和多尺度重构。

2.3 空间组织的地域差异性

不同区域的乡村因自然、历史、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空间形态，乡村生活圈构建也不具有统一模式，应是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空间组织。

首先是空间基础条件的差异。受区域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以及长期历史格局影响，我国乡村居民点中观层面的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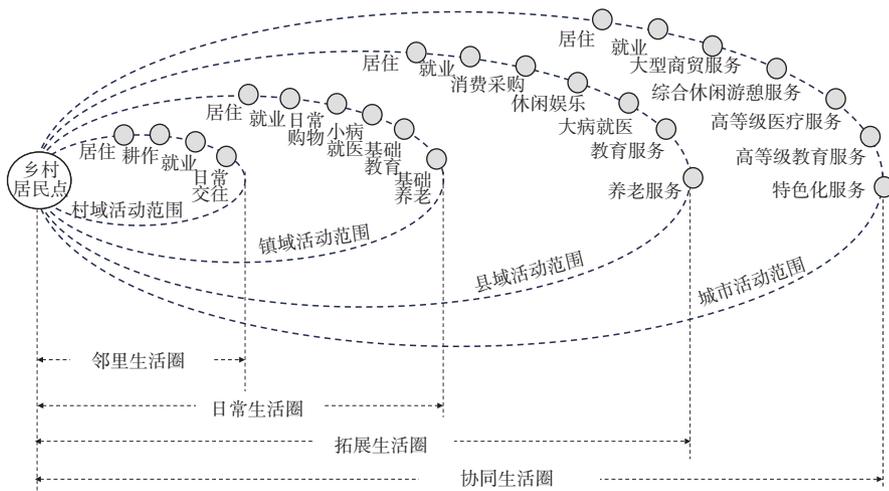


图1 乡村生活圈的多尺度空间连续性特征

Fig.1 Multi-scale spatial continuity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ife circles

异很大，空间分布上呈现团状集中、条带状分布、大分散小集中等完全不同的空间形态，直接决定了居民出行方式和时间。不同区位和资源禀赋造就了不同的乡村产业，传统农业、加工制造、旅游服务等不同活动占比有所差异，相应的人口构成和服务需求也不同。这些条件都直接影响到乡村生活圈的空间范围、圈层划分以及相应设施配置的门槛条件，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组织。

其次是城乡关系叠加的差异。随着城镇化和产业化进程发展，加之国家多重战略在乡村地区叠加的影响，不同乡村所处的地区城乡关系分化更加明显，乡村生活圈构建需要应对差异化的城乡格局。比如：城市化区域的乡村，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乡村与中心城市交流频繁，生活圈构建需要注重协同城乡生活圈的功能层级，共享高层级城市服务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区的乡村，一般以县域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场域，生活圈组织更注重以县域为单元，完善县—镇—村三级生活服务供给；区位偏远、生态脆弱地区的乡村，人口外流、村落分散、交通不便，可能更需要依托县城或重点镇进行片区化生活服务组织，保障乡村基础功能。

3 城乡关系变迁与乡村生活圈构建的挑战

3.1 乡村人口收缩与社会结构转型

“人”的变化对乡村生活圈构建产生

直接影响。一方面，乡村人口规模持续下降，空心化和老龄化双重叠加。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将降至2.62亿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高达28.1%—30.9%^[19]。总体规模缩减、人口过疏化、老龄化加深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普遍面临的趋势。另一方面，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增强，社会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乡村人口呈现双向流动新格局。随着乡村人口外流和空心化，内部分层分化，村庄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和分散化特征明显^[20]。而同时，返乡群体成为城乡人口逆流的一种新趋势^[21]，“新村民”现象重塑乡村人口结构的多元化。据不完全统计，从2012年到2022年底，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220万人^[22]，形成新型“归村”群体。乡村人口规模缩减造成居住生活空间稀释化，对生活圈的时空尺度带来新挑战；人口流失与聚集并存、人口分布非均质化，要求生活圈的层级类型更加多样化；人口结构分化、群体多样化，对生活圈功能供给提出新要求，组织模式需要从“全面覆盖”转向“精准适配”。

3.2 乡村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

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影响乡村生活空间的组织形式。首先，生产方式转型，就业活动多元。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趋于走向消亡，农业经营方式从分散化转向规模化、组织化。一是职业化农民作为新型经营主体，而不一定是本

土村民；二是非农就业比例上升，村民职业多角色化，既可以在乡村从事非农产业活动，又可以城镇就业为主、城乡两栖，还可能是城乡兼业状态，在城市有工作，在乡村也有事做。乡村高频次短距离的本地城乡就业通勤比例增大，城乡通勤的空间范围也在增加^[23]。其次，生活方式跃迁，高质量生活需求增加。中国乡村居民消费正打破传统的“村—镇—县”三级体系，形成“日常消费在村庄、高级消费在县城、便利消费在线上”的新型结构^[24]。就学就医、休闲娱乐、探亲等活动等在村—县之间联系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对于居住在东部发达地区或距离城市较近的居民来说更为明显^[25]。更多乡村居民倾向选择县城及以上的公共服务，也造成部分乡村基层公共设施“空心化”。随着乡村经济非农化加深、乡村生活方式的转型跃迁，加上城乡交通通达性的提高，乡村居民日常活动空间不断向镇区、县城（区）渗透，形成了就业、居住、获取公共服务城乡融合的空间活动特征。这将直接影响到乡村生活圈的圈层构建观念体系和使用方式。

3.3 城乡地域空间系统重组

乡村空间收缩与时空扩展并存。一方面，随着乡村人口规模减少，大量村庄进行撤并集中，村庄聚落空间向“大聚集、小分散”集约化发展。从行政村减少的数量来看，2007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减少约6000个行政村；从自然村来看，1991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减少4.7万个自然村^[26]。另一方面，生活居住空间稀释和居民点集中，但交通条件与通信技术的应用延展了乡村空间联系的时空维度，乡村内部与外部的信息、物质流动与联系不断增强，使得乡村生活空间尺度、生活圈服务半径都在进一步扩展。

传统乡村地域等级体系改变。传统的“村—镇—县”等级体系中，“村—县”和“镇—市”的联系不断增强，对乡村居民来说，县城作为公共服务地和商品服务地的重要性凸显，小城镇功能和地位不断下降。通勤半径扩大引发“县城居住—乡村生产”的跨域生活模式，就医就学时空行为改变引发“县城

集中—乡镇衰减”的设施配置极化。城乡空间体系网络化特征初显。在乡村产业非农化、“三产”融合的趋势下，乡村地区以农业为主导的均质化形态被打破，部分乡村成为城市居民休闲游憩、文化传承、生态体验甚至承接新产业、新业态的重要空间。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交流的空间模式由原先单向的村—镇联系，转变为镇村之间、村村之间的双向、多向互动联系^[7]。

4 城乡融合发展导向的乡村生活圈构建规划思考

4.1 面对乡村发展不确定性，动态适应城乡变迁过程

乡村生活圈的形态取决于未来城镇化的结构。城镇化结构形态仍处于不断演化中，乡村地区面临人口持续收缩、社会结构转型、空间形态重组等多重不确定性，因此乡村生活圈的构建也将是一个持续、弹性的动态过程。

加强对城乡动态系统的关注。乡村生活圈的构建嵌入在不断变化的城乡地域系统中，规划需要突破静态的、层级化的城乡关系认知，重点关注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功能互动和空间关联的动态过程，关注新业态、新生活方式引发的新乡村空间现象，确保乡村生活圈规划的弹性和适应性。

建立动态的规划干预机制。建立“识别变化—评估影响—调整干预”的规划机制，重点加强对城乡关系演变趋势、乡村人口和经济动态、居民行为模式变迁等的跟踪研究和前瞻研判，提高乡村规划对乡村格局不断变化重构的响应能力。加强规划监测评估和动态优化，建立常态化的乡村问题诊断、政策影响评估和需求反馈机制，动态优化调整生活圈的规划目标、空间组织和实施行动，推动形成“规划—实施—监测—评估—优化”全生命周期的规划干预机制。

推动从“设施配置”向“服务供给”转型的动态机制建设。应对乡村人口变化、需求多样化，生活圈规划理念应从传统的“设施全覆盖”转向更灵活的“服务全覆盖”。采用固定设施与流动服务、线上平台与线下配置相结合的模式，提高设施利用效率和服务覆盖弹性。识

别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差异化需求，从普适性设施覆盖转向精准化服务供给。

4.2 面对“三农”结构性变化的挑战，应对差异化发展前景

城乡关系转型带来乡村地区农业、农村、农民的结构转变，并进一步引发不同地区“三农”问题的结构性差异，规划应积极响应乡村差异化发展前景，分类引导、精准施策。

面向区域发展梯度的分层差异。城乡联系强度、资源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和动力不同，乡村在区域格局中呈现“都市化地区—县域腹地—偏远地区”的梯度差异。对于高度城镇化地区、大都市郊区乡村，生活圈构建的核心是推动城乡服务一体化、功能互补化和空间协同化，提供高品质、多元化的生活服务。对于以县域为载体的广大腹地乡村，生活圈构建应强化县城与重点镇的服务节点作用，依托交通连接加强网络化服务体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可达和生活便利性。对于区位偏远、发展条件薄弱的乡村，乡村生活圈的目标应是保基本、提效能，依托重点镇配置基础服务功能，探索“片区化”组织模式、灵活性的服务供给方式，实现基本服务供给覆盖与效率提升。

基于乡村地域功能的分类差异，从城乡关系转型和乡村功能性差异的角度，结合未来的乡村发展前景，乡村生活圈构建至少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地区，农业生产、农村功能和农民身份发生整体改变，生活圈规划应弱化独立的乡村服务系统概念，强调与城市生活圈在空间、设施、服务、治理上的无缝衔接，配置满足城乡多元人群（原住村民、新村民、通勤者等）需求的复合型功能。

第二类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地区，主要是粮食生产区，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转型进而引发人地关系改变。规划需要引导适度集中居住，形成与规模化现代农业产业链相适应的居民点和服务体系。

第三类是乡村特色化发展地区，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在城市消费方式转型带动下，拓展出乡村文旅、康养、文创等特色新功能，乡村人口结构也出现新变化。生活圈构建需要打破传统空间

层级，以特色功能为核心组织多尺度复合的网络体系，提供个性化、品质化的服务供给，并考虑与游客、短期居留者等新群体的需求对接。

第四类是生态脆弱和重点保护地区，核心矛盾是人居环境改善、基本服务保障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生活圈构建重点是面对分散空间格局和持续收缩趋势，保障老年人等留守人群的基础生活，依托少数条件适宜的集镇或中心村进行适度集聚与服务覆盖，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4.3 面向乡村空间格局的重组，重新认识县—镇—村功能体系

城乡时空尺度进一步压缩，乡村空间格局和功能体系面临重组的要求。规划应突破就乡村论乡村的局限，从区域空间整体性和功能协同的角度，对县—镇—村三级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

关注城乡体系的变化趋势。“城—县—镇—村”体系结构呈现由层级化向网络化发展的特征，规划需要关注乡村与周边乡镇、县城以及跨乡镇之间的功能联系和要素流动，打破传统的行政或地理圈层，形成多层次、复合的空间组织框架，使乡村生活圈嵌入更大范围的城乡功能网络。

加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空间统筹。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路径，在县域单元内统筹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对乡村地区的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县城的核心作用，作为连接更高等级城市与基层乡村的转换枢纽。

高度重视小城镇作为基础服务节点的作用。随着乡村空间重组和居民活动范围扩大，小城镇在未来乡村生活圈中应承担基础性服务供给的作用。引导小城镇适度集聚，形成以“小城镇为核心、村庄为末梢”的高效供给网络：小城镇负责向乡村地区提供日常高频、标准化的基础性服务，同时接收并向下传递县城提供的高等级、专业化服务；村庄则主要为邻里需求或特定人群配置嵌入式微服务，接受小城镇的服务辐射。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区，空间集聚的趋势有很大差异性，对县—镇—村的空间组织更需要因地制宜地规划考虑。

4.4 面向城乡双向流动的要求，系统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路径

乡村生活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不仅是空间组织的优化，更是适应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深城乡功能互动的系统性治理工程，在治理层面构建系统协同、动态适应的政策路径。

加强政策顶层设计，注重系统协同。突破部门与层级界限，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框架下，以系统思维统筹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多领域政策协同。通过多尺度政策协同，实现国家宏观战略、区域功能布局与地方实际需求的有效衔接；通过多类型政策配套，促进土地、金融、人才、数据等要素在城乡间的顺畅流动与优化配置。

鼓励地方探索，加强政策动态评估。充分赋权地方结合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开展差异化探索，特别是在生活圈空间组织、服务供给模式、共建共治机制等方面创新实践。建立科学的政策评估和动态监测机制，形成“实施—评估—调适”的良性循环，确保政策与治理举措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强化规划引领与空间治理效能。充分发挥规划在统筹城乡空间资源、协调多元主体利益、搭建政策协同平台方面的战略引领和系统整合作用。将乡村生活圈构建融入各级空间规划体系，加强与空间规划为平台统筹政策机制、多规合一的能力，引导资源配置，支持政策的精准落地和系统集成。

5 结语

加强乡村生活圈构建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重要议题。生活圈不仅是保障乡村居民日常需求的基础单元，更是促进城乡功能互补、要素流动和空间重构的战略性载体。城乡融合是乡村生活圈构建的战略导向和价值基础，以此为出发点，需要加深对乡村生活圈综合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价值认识，把握其动态性、多层次、多类型及差异化的基本特征。

乡村生活圈的构建既面临人口收缩与社会结构转型、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城乡空间系统重组等一系列现实挑战，也需要应对面向未来的发展挑战，包括

城乡结构转变的宏观趋势、乡村发展的不确定性、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乡村发展前景的显著分化等。因此，乡村生活圈的构建需要前瞻性适应城乡关系网络化、要素双向流动的未来趋势。面向未来的规划实践，倡导建立动态适应的规划干预机制，以分层、分类规划策略应对乡村差异化前景，在城乡连续的开放系统中重构县—镇—村功能体系，并通过系统性的治理创新促进多维度的城乡融合。

参考文献

[1] 肖作鹏, 柴彦威, 张艳. 国内外生活圈规划研究与规划实践进展述评[J]. 规划师, 2014, 30(10): 89-95.

[2] 袁家冬, 孙振杰, 张娜, 等. 基于“日常生活圈”的我国城市地域系统的重建[J]. 地理科学, 2005(1): 17-22.

[3] 柴彦威, 张雪, 孙道胜. 基于时空行为的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3): 61-69.

[4] 柴彦威, 李春江. 城市生活圈规划: 从研究到实践[J]. 城市规划, 2019, 43(5): 9-16.

[5] 于一凡. 从传统居住区规划到社区生活圈规划[J]. 城市规划, 2019, 43(5): 17-22.

[6] 刘泉, 钱征寒, 黄丁芳, 等. 15分钟生活圈的空间模式演化特征与趋势[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6): 94-101.

[7] 张帆, 杨保军, 董珂, 等. 概念·方法·实践: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的核心要义辨析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1): 1-8.

[8] 周弦.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视角的单元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评估: 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1): 57-64.

[9] 李萌.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特征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对策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1): 111-118.

[10] 付毓, 田菲. 需求导向下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编制思路[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人民城市, 规划赋能: 202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6乡村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 2023.

[11]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S/OL]. [2021-12-03]. <https://ghzjy.sh.gov.cn/zcfg-cxgh/20220107/fde7d67b4de740bf8a67d67669888854.html>.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TD/T 1062-2021[S].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21.

[13] 马倩丽, 何微丹, 李晓军, 等. 乡村生活圈空间优化与差异化设施配置研究: 以广州为例[J]. 规划师, 2024, 40(12): 58-66.

[14] 葛丹东, 梁浩扬, 童磊, 等. 社区化导向下衢州芳村乡村生活圈营建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21(10): 30-35.

[15] 曾鹏, 王珊, 朱柳慧. 精明收缩导向下的乡村社区生活圈优化路径: 以河北省肃宁县为例[J]. 规划师, 2021, 37(12): 34-42.

[16] 孙德芳, 沈山, 武廷海. 生活圈理论视角下的县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以江苏省邳州市为例[J]. 规划师, 2012, 28(8): 68-72.

[17] 徐馨阳. 上海郊区乡村生活圈构建模式研究: 以浦东新区为例[D]. 同济大学, 2024.

[18] 孙卓元, 黄勇, 王薛. 家庭视角下乡村生活圈建构的本土化理论探索[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6): 27-36.

[19] 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课题组, 韩长赋. 迈向2050年的中国农村人口和乡村变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5(6): 4-10.

[20] 贺雪峰. 最后一公里村庄[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21] 石智雷, 冯一桃. 乡村人口变动与人口高质量发展困境[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78(2): 178-192.

[22] 人民网. 大学生、海归、企业家…10年间1220万人返乡当了新农人[EB/OL]. (2023-12-18) [2025-05-2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1218/c1001-40141655.html>.

[23] 赵鹏军, 胡昊宇, 于昭. 中国乡村交通出行与地域系统[J]. 人文地理, 2020, 35(4): 1-8.

[24] 刘浩. 乡村生活现代化: 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消费空间变迁[J]. 社会科学研究, 2023, (3): 124-132.

[25] 赵鹏军, 于昭, 贾雨田. 中国村镇居民跨区域出行与乡村地域系统调查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4): 498-508.

[26] 魏后凯. 减速期中国城镇化转型与村镇发展 [R/OL]. (2024-06-13) [2025-05-20].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2435.html>.

[27] 田琳, 程遥, 钮心毅. 网络视角下的镇村空间组织: 基于杭州市临安区居民出行联系的分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23(1): 104-110.